



ZHONGGUO SHIGE
FASHENG SHI
朱炳祥 著

中国诗歌发生史

ZGSGFSS

武汉出版社



(鄂)新登字 08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诗歌发生史/朱炳祥编.——武汉:武汉出版社,1999.12

ISBN 7-5430-2034-3

I. 中… II. 朱… III. 诗歌史-中国 IV. I207.2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9)第 72006 号

书 名:中国诗歌发生史

著作责任:朱炳祥

责任编辑:王远彦

封面设计:刘福珊

出 版:武汉出版社

社 址:武汉市江岸区北京路 20 号 邮 编:430014

电 话:(027)82842176 82839623

印 刷:武汉市新华印刷厂 经 销:新华书店

开 本:850×1168mm 1/32

印 张:10.25 字数:220 千字 插 页:5

版 次:2000 年 2 月第 1 版 2000 年 8 月第 2 次印刷

印 数:1001-3000 册

ISBN 7-5430-2034-3/I·296

定 价:16.50 元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由承印厂负责调换。

《中国诗歌发生史》序

夏传才

《诗经》是中国诗歌由口头创作转化为书写文学的第一部诗歌集，被称为中国文学的光辉起点，中国诗史和中国文学史都是从它开始记述的。由口头歌谣创作向书写诗歌的转化，是一个漫长的若干万年的发展过程，探讨原始歌谣的起源、功用、本质及其在发展中一次次的质的飞跃，溯本清源，可以获得两个重要的答案：一是在我们民族文化的土壤上，三百篇是历史的必然产物；二是包蕴在三百篇艺术中的遗传基因，是诗歌文学的本质的品格，它们经过不断的发展和升华，终于建构了我们民族三千年光辉灿烂的诗史。朱炳祥先生的新著《中国诗歌发生史》，正是研究中国原始诗歌的起源和发展，所以是一部很有意义的专著。

研究原始歌谣的起源和发展，难度很大。这因为口头流传的歌谣，在创造出文字以前，不能记录下来，古人辑集的谣谚、逸篇，一部分是伪托，一部分也经过改作，难以进行科学的研究。所以研究这个课题，必须别辟蹊径。20世纪初兴起于西方的文化人类学，为原始文化研究提出了理论和方法，“五四”以后的学者胡适、郭沫若、茅盾、郑振铎、顾颉刚、闻一多等先生都曾有所借鉴，或研究上古社会，或研究上古神话，或研究民俗，或研究《诗经》，各

有创获。80年代以后,在《诗经》研究领域,借鉴文化人类学的方法论,进入了兴盛的时期,已经涌现了一批成果。如赵沛霖先生的专著《兴的源起》、叶舒宪先生的专著《诗经的文化阐释》、李湘先生的专著《诗经特定名物应用系列》以及刘怀荣先生的论文《比法思维的发生学研究》、杨子怡先生的论文《诗经中“人”的解读》等等。这些论著大都在探讨比兴的起源和《诗经》中原始意象内涵,通过原型类比来阐释诗篇意象隐喻的意义和深层内涵,都达到一定的深度,令人耳目一新。而以《诗经》为主要的材料,系统地研究原始诗歌的起源和发展,这部《中国诗歌发生史》,是我见到的第一部专著。万事开头难,尤其是从上古初民遥远渺茫的艺术世界探幽索微,清理古老诗歌的发展脉络,著者的气魄、智慧与付出的艰苦,令人感佩。

文化人类学是包含各分支的综合性学科,20世纪前期的法国学者 Marcel Granet,中期的日本学者赤塚忠、松木雅明、白川静,都以运用文化人类学理论和方法研究《诗经》而成名家。他们最显著的特点,是以人类学的视野,综合应用社会民俗学、神话学、民族学、历史考古学的理论和方法,比较各民族的差异和共同性规律,探讨《诗经》的起源、本体内容、文化底蕴和艺术规律,开拓了《诗经》研究广阔的新领域。他们视野的开阔,角度的新颖,思想挖掘的深度,在《诗经》研究史上确是前无古人的。但是,在另一方面,他们毕竟是外国人,对中国古籍的解读以及对中国古代历史的了解,都难免发生许多失误,同时将不同国家地区的民俗和歌谣类比研究,未能充分注意它们时代性、地域性的质的差异,因为对中国社会缺乏全面、深刻的了解而产生误释。

我们中国人,自己对古籍的训诂,文献的真伪,金文、

甲骨文等古文字的辨识,以及上古历史与社会形态,也没有完全弄清楚,因此我们不能苛求外国学者,但是我们应该注意避免外国学者的失误。中国的《诗经》文化人类学研究的学者正是努力这样做的,他们大都重视古文献的正确解读,注意中国古代文化自身的品格和特点,在多文化比较时,既尊重共同性规律,又不作简单化的类比,借鉴文化人类学的方法论而不机械地生搬硬套。我读了朱炳祥先生这部专著的引言和前两章,看到他也是努力这样做的。

这是一部开创性的洋洋 26 万言的专著,当然不可能字字珠玑,提出的观点、论证也不可能百分之百正确,人的认识是一个不断由浅入深、由片面向全面、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过程。著者提出了这个重要的课题,而且建构了研究这个课题的体系,这个意义就很大。我对这个课题没有研究,读了一部分书稿,增长了知识。在这一方面,著者比我有学识,但著者来信囑为作序,却之不恭,虽正值病中,因为有上面一些话要说,乃应命写了这篇短短的作文。

1999 年 2 月 21 日于思无邪斋

中国诗歌发生史



ZHONGGUO SHIGE
FASHENG SHI

中国诗歌发生史

ZGSGFSS



目 录

《中国诗歌发生史》序 夏传才

引 言	(1)
第一章 问题的历史	(5)
第一节 古代研究摘要	(5)
第二节 现代研究撷英	(11)
第二章 材料与方法	(21)
第一节 材料的困惑	(21)
第二节 多重文化时空层叠与整合	(29)
第三节 “发生学还原”的方法	(37)
第三章 符号的生成及其一般特征	(49)
第一节 人类符号器官的形成及其功能的产生	(50)
第二节 符号的一般特征	(64)
第四章 汉语的起源及“歌”“诗”发轫	(78)
第一节 汉语的发生学道路	(78)
第二节 原始汉语的诗性特征	(93)
第三节 一个实证性的个案分析	(98)
第四节 “歌”“诗”发轫	(117)
第五章 巫术咒语歌——中国诗歌发生第一形态	(138)

第一节	巫术观念的产生	(138)
第二节	巫术咒语歌的形态	(148)
第三节	“赋”之生成	(161)
第四节	“比”之原始	(173)
第六章	图腾亲情歌——中国诗歌发生第二形态	(182)
第一节	从巫术观念到图腾观念	(182)
第二节	图腾亲情歌	(187)
第三节	《诗经》兴象的实证分析	(206)
第四节	“兴”之释义与原始审美观念的发展	(221)
第七章	神话叙事歌——中国诗歌发生第三形态	(233)
第一节	神话的起源及其与诗歌的发生学联系	(234)
第二节	神话叙事歌举例	(242)
第三节	“风”之还原	(259)
第八章	宗教祭祀诗歌——中国诗歌发生第四形态	(272)
第一节	宗教世界观之界定	(272)
第二节	宗教祭祀诗歌的情感形式	(279)
第三节	“颂”之语义内涵的历时性分析	(303)
第九章	汉字诗歌——中国诗歌发生的完成形态	(309)
第一节	汉字的产生及其与汉语的原始关系	(310)
第二节	汉字对中国诗歌形成的影响	(314)
后 记		(320)

诗歌是文学的重要形式,也是文学的最初形式;诗歌发生问题的研究,就是文学发生问题的研究。独立的、成熟的诗歌如古希腊的荷马史诗、我国的《诗经》、印度的《梨俱吠陀》产生于“轴心时代”^①,这些已经形成的诗歌,是在原始文化的土壤里生长和发展起来的;而诗歌在原始文化土壤中生长发展的历史,是一个一直未被注意的问题。

就一般性的艺术起源研究,早在“轴心时代”即已开始,发展到现在,诸说并存,纷繁复杂。有研究者论及说:

从古希腊哲学家们的模仿说算起,至今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在这个漫长而有趣的研究史中,先后有哲学家、科学家、历史学家、艺术理论家、考古学家、心理学家和人类学家等不同学科领域的人物,从各自不同的角度,提出过许许多多的见解,其间能自成体系且有一定影响的艺术起源论,至少也有近十种之多。比如,模仿说、情感和思想交流需要说、劳动说、

① “轴心时代”是西方学者提出的一个学术概念,指公元前 800 年至公元前 200 年。也有的学者将其扩大到公元前 1000 年至公元元年。参见雅斯贝尔斯:《智慧之路》,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88 年版,第 69 页;冯天瑜:《中华元典精神》,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 年版,第 97 页。

游戏说、巫术说、季节变换的符号说、集体无意识说、心理投射说等诸类。今天,每一个试图在这个领域中进行研讨或对这个课题感兴趣的人,首先就会感到自己是处在古今各种不同的理论假说的包围之中,于是,所能做的似乎不外乎这样两种工作:或者从各种说法中选择一种我们认为是可以接受的,进而重新搜罗组织材料,做一番证实和证伪的尝试;或者对以往诸说均持否定态度,而另辟蹊径去构想和论证一种新的起源说。

事实上,已往的研究史本身就是大致按照上述两种方式发展起来的。每一种起源论都有一定的支持者,同时也有为数更多的反对者。他们互相批评、反驳,力图表明自己理论的合理性和其他理论的片面性,不合理性。就像古人所说的“家有弊帚,享之千金”,“东向而望,不见西墙”。然而,迄今为止,我们所看到的仍然是这样一种现象:证明似易而证伪实难。也就是说,以一定的事实材料为基础,经过无懈可击的推理过程去证明一种假说是比较容易做到的,但要真正否定掉其他的假说则相对不那么容易了。就连最早产生的“模仿说”,虽然千百年来屡经批驳,至今仍有相当数量的拥护者或再发现者,仍有其存在的权利。唯其如此,在这个领域中才没有出现像在其他学科领域中那样新说取代旧说(如日心说取代地心说)或新说同化旧说(如量子物理学同化经典物理学)的“范式”革命,而呈现为一种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的情形。^①

在这种局面下,现代的研究努力超越现状,试图找到一种新的途径对以往各派理论进行系统综合,于是中西方都有一些学者主

^① 俞建章、叶舒宪:《符号:语言与艺术》,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0-31页。

张多元性起源理论。这些多元论的倾向，“并不就是对在艺术起源问题上众说纷纭的一种无可奈何的调和折衷，而在于在艺术最初的阶段上，可能就是由多种多样的因素所促成的，因此推动它得以产生的原因不能不带有多元论的倾向”。^① 多元论可以看作研究史上的第三种方式。

然而，无论是一元论还是多元论，基本上都忽视了一个问题：起源和发生本身就是一个过程，就是一种历史。包括诗歌在内的艺术是在原始文化中发生的，到了理性觉醒时代走向独立，而原始文化是一个持续了几百万年的动态发展过程。艺术起源问题的研究既应该有理论性的探讨，更应该有起源历史的研究。诗歌发生问题的研究也应该是这样，但至今还没有出现在这个问题上的系统研究，一般的研究皆不将中国诗歌在原始文化中的发生作为一个动态过程来研究，要么只是进行静态的理论性描述，要么只是笼统地归结为原始文化的某个要素或某几个要素。有些古代研究者虽然也有涉及到这个问题的三言两语，这是值得注意的，我们在第一章中将对此进行梳理，但毕竟只是即兴式的感触，粗疏宏放，无边无垠。逻辑的研究如果没有历史的研究支撑，那就等于一座房子没有支柱。本来，严格意义上的中国诗歌史，应该包括中国原始诗歌的各个阶段和文明时代诗歌的各个阶段，原始时代的诗歌史是“中国诗歌发生史”，文明时代的诗歌史是“中国诗歌发展史”，发生史和发展史都是“中国诗歌史”；但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学者们撰写的中国诗歌史著作，却只从《诗经》开始，算起来只有短短的三千年的历史。三千年与上百万年相比，犹如大树之梢的毫厘之截。而且，我们现在看到的仅存只言片语的所谓“原始诗歌”，仅为文字肇始之初，文人们运用汉字对于口头流传歌谣的改铸。然而汉字并非单纯是记录汉语的符号体系（详见第九章），当用汉字来书写

^① 朱狄：《艺术的起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171页。

诗歌时,有一个如何与口头流传的汉语诗歌协调的问题。另一方面,原始诗歌词语鄙俚,阴阳人鬼之间,褻慢淫荒,文人们以为不雅,往往“更定其词,去其泰甚”,原始诗歌便因文人们之好事而失却原貌。并且,原始诗歌中的事神之心,往往被用来寄托政治教化、人伦世事之意。本来留存下来的就不多,如此一来二去,可信的就如凤毛麟角,注重考据的庄严肃穆的中国学术对此当然很不一样了。学者们所著之《中国诗史》,从《诗经》开端也就是自然的了;至于《诗经》以前的古诗歌,仅据前人《风雅逸篇》、《古逸》、《古诗源》等书之集录,略取二三,不大在意地称其为“诗歌之起源”,还不忘声明:“它们既然真伪难分,我们也就无所依傍了。”^①

这样一种状态,使得中国诗歌发生史的建构成为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这种建构是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建构,它只能在原始文化领域中进行,而文化人类学主要以原始文化为研究对象,那么这种建构就可以在文化人类学领域中进行。朱狄先生曾说:“文化人类学在国外是一门新兴学科,它涉及到人类文化起源等一系列重大问题。我早就有一种预感:美学的一些基本问题的研究将要在文化人类学的领域中进行。”^② 不仅中国诗歌发生各要素是在中国原始文化土壤中产生的,而且中国诗歌发生各形态也是在中国原始文化的发展中形成的。诗歌是人类审美意识的重要形式之一,诗歌发生的基本问题的研究也应在文化人类学领域中进行;唯其如此,方能获得其品格与深度。

本书即为运用文化发生学(文化人类学的一个分支)的方法对中国诗歌发生史进行研究 with 建构的一次尝试。

① 陆佩如、冯沅君:《中国诗史》,山东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3页。

② 朱狄:《原始文化研究》,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805页。

第一章 问题的历史

古代学者最初对中国诗歌起源和发生问题的一般性关注,大体与成熟诗歌的出现同时或稍晚,到现在为止,已经有两千多年;开头只是只言片语,后来的论述是越来越丰赡了。本章简述在这个问题上的研究历史。

第一节 古代研究摘要

先秦学者最先的探讨旨在指出诗歌起源的原因。《尚书·虞书·舜典》载:“诗言志,歌永言”。这个“志”,是个内涵很复杂的概念,《左传》昭公二十五年云:“民有好、恶、喜、怒、哀、乐,生于六气。是故审则宜类,以制六志。”孔颖达《毛诗正义》说:“此六志《礼记》谓之‘六情’。在己为情,情动为志,情、志一也。”在古人的心目中,人的所有思想、感情、志意、欲念都可以称为“志”。“诗言志”,就是说诗产生的原因是为了表达思想感情。

《诗大序》对诗歌发生原因的讨论较之《尚书》更为展开:

情发于声,声成文谓之音。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故《诗》有六义焉,一曰风,二曰赋,三

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故曰《风》。至于王道衰，礼义废，政教失，国异政，家殊俗，而《变风》、《变雅》作矣。国史明乎得失之迹，伤人伦之废，哀刑政之苛，吟咏情性以风其上，达於事变而怀其旧俗者也。故《变风》发乎情，止乎礼义。发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礼义，先王之泽也。是以一国之事、系一人之本谓之《风》，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风谓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废兴也。政有大小，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是谓四始，《诗》之至也。

这段话，讲了诗歌发生的三个方面原因：“动天地，感鬼神”、“告于神明”，这是为了与神交通；“正得失”、“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这是为了政治教化；“发乎情”、“吟咏情性”以及“美教化”之“美”、“美盛德形容”之“美”，这是为了审美。《诗大序》认为政治教化应该寓于审美之中，才能发挥巨大的作用；对于鬼神的沟通也需要诗歌审美的帮助，才能感动鬼神。诗歌之所以发生的原因，正是由于人们需要以此与神沟通、以此实行政治教化、以此吟咏情性。

关于“志”变成“诗”的过程，《诗大序》又说：

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

由心中之“志”到口中之“诗”经历了“志(情) - 言 - 嗟叹 - 永歌(诗)”的发生过程，但这一过程并非指诗歌发生的时间过程，而是一个简单的、体验式的心理过程。

汉代一些诗论者在诗歌发生的原因上承继了先秦“诗言志”的

看法,并认为诗、志是一回事。“汉朝人每训诗为志:诗之为言志也。(《诗谱序》疏引《春秋说题辞》。)诗之言志也。(《洪范·五行传》郑《注》。)诗志也。(《吕氏春秋·慎大览》高《注》,《楚辞·悲回风》王《注》,《说文》。)”^①同时,他们对诗歌发生的时间、社会原因等问题也作出了进一步的思考。郑玄《诗谱序》说:

诗之兴也,谅不于上皇之世。大庭轩辕逮于高辛,其时有亡载籍,亦蔑云焉。《虞书》曰: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然则诗之道放于此乎?有夏承之篇章,泯弃靡有孑遗。迨及商王,不风不雅。何者论功颂德,所以将顺其美刺过讥失,所以匡救其恶,各于其党,则为法者彰显,为戒者著明。周自后稷播种百谷,黎民阻饥,兹时乃粒,自传于此名也。陶唐之末中叶,公刘亦世修其业,以明民共财。至于大王王季,克堪顾天。文武之德,光熙前绪以集大命于厥身,遂为天下父母,使民有政有居。其时《诗》“风”有《周南》、《召南》,“雅”有《鹿鸣》、《文王》之属。及成王周公致太平,制礼作乐,而有“颂”声兴焉,盛之至也。本之由此,风雅而来,故皆录之,谓之诗之正经。后王稍更陵迟,懿王始受譴亨,齐哀公夷身失礼之后,《邶》不尊贤。自是而下,厉也幽也政教尤衰,周室大坏,《十月之交》、《民劳》、《板》、《荡》勃尔俱作。众国纷然刺怨相寻。五伯之末,上无天子,下无方伯,善者谁赏?恶者谁罚?纪纲绝矣,故孔子录懿王夷王时诗。论于陈灵公淫乱之事,谓之《变风》、《变雅》。

这段论述,可说是郑玄心目中的中国诗歌发生学。郑玄首先追问了诗歌起源的时间,他说“诗之兴也,谅不于上皇之世”。郑玄

^① 闻一多:《神话与诗》,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01页。

可能以有无文献记载作为诗歌产生的依据,故判断“上皇之世”诗歌尚没有兴起,可知郑玄心目中的“诗”,不包括原始时代的诗歌。只是到了《尚书·虞书》中有了“诗言志,歌永言”的说法,郑玄方据此判断“诗之道放于此”。其次,郑玄追问了诗歌起源的原因并指出了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而出现的一些具体篇章,这与《诗大序》的看法相承。《诗大序》说:“王道衰,礼义废,政教失,国异政,家殊俗,而《变风》、《变雅》作矣”;郑玄将这种看法细致化,举出《诗经》中最早的周代的诗歌的许多具体篇章来说明它们都是适应社会政治变化而产生的,这是从社会原因上来分析诗歌起源的。

从上面的材料看,先秦两汉的学子们对诗歌起源的探索是怀有很大热情的,这并非他们有着如古希腊学者那样浓烈的理论兴趣所致,而是他们对诗歌的功能的重要性认识所致。此外,先秦两汉的学者还认为无论是政治教化也好,还是与鬼神沟通也好,都应该与审美功能结合在一起,才能发挥巨大的作用。基于这两种认识,才使他们特别重视诗歌,也才使他们在“中国诗歌发生”(主要是《诗经》的发生)的一些基本问题上提出了创造性的见解。

魏晋以后的学者将先秦的看法扩大开来。六朝人刘勰《文心雕龙·明诗》说:“在心为志,发言为诗,舒文载实,其在兹乎!诗者,持也,持人情性。……人禀七情,应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这是对先秦提出的诗歌起源的心理原因及过程的继续思考。沈约在《宋书·谢灵运传论》中说:“虽虞夏以前,遗文不睹,禀气怀灵,理无或异。然则歌咏所兴,宜自生民始也。”这个看法是对诗歌起源时间的思考。沈约否定了郑玄的看法,既然“诗言志”,“志”应该自生民以来就有的,那么“诗之兴谅不于上皇之世”的看法就是失却依据的。沈约推测诗歌起源与人类起源同步,这是一个大胆的意见,逸出了考据学重证据的传统,但也显得空疏,并无证明。沈约不是注经大师,这里只是随感式的发点议论,他的意见影响不大。到了唐代孔颖达,又回归考据学,他在《诗谱序·疏》中不同意郑玄